

·徽州文献·

《新安蠶狀》探析

汪 庆 元

一、《新安蠶狀》简介

徽州文书档案由于是第一手资料而受到明清史学研究者的重视。徽州文献也有属于档案汇编的形式。《丝绢全书》就“无异明代徽州府衙门中的一批卷宗”，“与徽州地方发现之房地契约同有史料保存的价值。”^①新见之《新安蠶狀》亦属此类。

《新安蠶狀》二卷，明万历刻本，未见著录。近人许承尧在杭州购得。其题跋略云：“是书乃孤本，虽多缺脱，而所为条教，犹可考见彼时风习，弥可贵也。余从杭州抱经堂书肆重直得之。”许承尧认识到了此书的社会史料价值。

书为明徽州知府古之贤编。古之贤，四川梁山人，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至十六年任徽州知府。《新安蠶狀》是古之贤任内徽州府的文件汇编。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为“议稿”，是古之贤向上司的请示报告，下卷为“牌票”、“告示”，是徽州府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端所采取的治理措施，故名“蠶狀”，有纠弊之意。该书有“缺脱”，其中“议稿”篇目二十，现存有十篇：呈详议加运官路费缘由；呈详新安卫征收屯粮缘由；呈详覆议休宁县买解南粮剩银缘由；申详院道严禁拐盗缘由；申详裁革坊里祇应粮长空役；呈详查议歛、休二

县水灾放赈;呈详申明新安卫老幼军人食粮;呈详覆议会计缘由;呈详亟议停征抵补救荒;议查革机户缘由。“牌票”八篇:行六县禁革娼优;行六县禁革重枷;行六县查革坊长祗应;覆行歙县查坊长科敛缘由;行六县申明起解钱粮;行六县劝士民葬亲;禁暴露亲尸;禁生员举贺耆民。“告示”十五篇:行六县严禁钻刺;行六县严禁白役;劝建齐云山桥;禁机户打点;禁机户钻刺;谕葬;谕新安卫城操官军字支领月粮;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行六县禁革粮长空役;行六县禁革秤头;禁革坊长祗应;救荒;禁约;禁生儒请托;禁童生喧闹。另有“训士录”一篇,“书札”一篇。江西道监察御史凌琯前序,歙县知县彭好古后跋。

该书是万历十四年四月至万历十六年,徽州府主要政务文件汇编。文件内容反映了徽州府行政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宽,时间相对集中,可见当时徽州社会生活的一个剖面。

二、所见徽州社会经济的变迁

(一)赋役制度

1.徽州一条鞭法的实例。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徽州府各县万历十一年实行^②。古之贤于万历十四年四月到任,建立有效的征收秩序成为当时政务要点。他在《呈道复议会计缘由稿》中申请徽州六县设立统一“征收之法”:

本府窃见由票之法务在简明,以便远乡愚民周知之意。而人各一法,且于查盘不便。今立票式申奉通行,然后画一。故议清(请)立征之法:在排年有总由票式,在花户有散由票式,在粮长有鸳鸯收票式。然仍要遵行投柜之法,严禁秤收之弊。实行一条鞭法后,怎样让农民知道自己该交纳多少银钱,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不被额外勒索,是设立“由票”,由农民“自封投柜”的目的所在。

“由票”是实施一条鞭法后出现的赋税征收通知单。古之贤精心

设计:“设立由票,填注各户田粮验派粮米数目,散给小民,执数派纳。”“将前项由票查照会计则例,将各户田粮本、折粮米各数,逐一填注由票。务及时遍给,俾户户得以知数,依期输纳。”^③当时“由票”实物至今仍有遗存。万历十六年《歙县税粮、条编由票》就是一例:

歙县税粮条编由票

直隶徽州府歙县为给由票以便输纳事。遵奉府帖申允会计派征万历拾伍年分税□[粮]:麦每石征银叁钱壹分贰厘捌毫,扛银叁厘玖丝;米每石征银肆钱壹分壹厘叁毫,扛银肆厘壹毫;丝每壹两征银伍厘,扛银叁毫肆丝。十六年条编:有免员役每丁止纳物料银壹分贰厘壹毫,扛银柒丝玖忽。(米)每石止纳物料银陆分伍毫,扛银叁毫玖丝;无免人户每丁总纳物料、徭费银柒分壹厘柒毫,扛银捌丝柒忽,(米)□□[每石]总纳物料徭费银叁钱伍分捌厘伍毫,扛银肆毫叁丝柒忽。奉此。给由票填注各户应纳银数,散给小民,照数输纳。如有派征不合官则,许令告究。须至由票者

计开

一户吴正宗系十七都二图四甲民籍 成丁一口

官民麦二斗七升四合八勺 丝一两二钱一分三厘四毫

官民米八斗八升三合

税粮共该银四钱九分六厘五毫

条编共该银三钱八分八厘八毫

右给付纳户

万历十六年贰月(县印) 日户给

县(押)

承行吏□□

□派费汪文□^④

这张由票版刻文字的主要内容是歙县征收税粮、条编的“官则”。其中不仅有丁、田两项负担条编银的具体数额,还有优免规则:“有免员役”不纳徭费,每丁只纳物料银一分二厘一毫,无免人

户每丁总纳物料、徭费银七分一厘七毫。通过由票“官则”还可见,行一条鞭法以后,歙县税粮中还有“丝每壹两征银伍厘”一款。歙县丝绢负担是龙凤年间确定的。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二·财赋》记载:乙巳年(1365)“歙县夏麦比附元额亏欠正耗脚九千七百余石,合将本县轻租民田三千六百四十六顷,每亩科丝四钱,补纳元亏麦数。”直至万历五年(1577),歙县不愿独自负担,提出由全府分担,因而发生了纷争^⑤。结果未能如愿,所以由票中仍有“丝”的名目。以上由票还载明,歙县“条编”和“税粮”(田赋)二项是分开计算的,以至万历三十六年歙县知县张涛著《条鞭议》说:“条鞭之法,四海通行,惟歙不然。既曰征粮,又曰征条,派征之法分为两端。”^⑥他要“复还条鞭本义”,将两项合而为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明代一条鞭法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

役法改革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徽州在隆庆三年(1569)就开始实行“均平银”:“均平者,见役里甲赋钱于官,给一岁用也。既输此,甲首归农,里长在役专事追征勾摄。其法自隆庆三年巡抚都院海(瑞)奏行一条编例始。”^⑦均平银是将原由里甲承当的差役“赋钱于官”,由官府雇募。实行均平银虽也称“一条编”,但只限于对里甲正役的改革。从隆庆三年至万历年间,徽州实行一条鞭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条编法立,里长祇应尽行裁革,悉照丁粮上纳官银,民向称便。”^⑧

明代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论述虽多,但各地情况不尽相同,详尽的实例很少,如徽州这样能以文献与文书相互印证的例子更不多见。

2. 粮长制度的演变。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很有特点。明初粮长由世家大族担任,为世代相承的永充制。明中叶以来,粮长阶层下移,粮区解体。徽州粮长虽然仍征收钱粮,但已经归到里甲,由中小户承当。古之贤在《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中要求“加添粮长以均劳逸”:

粮长十年一轮，除革空役外，若止用一正二朋，则空闲者甚多，人情不平。今议各里收各里，就于本里中不分里长甲首，止拣丁粮向上者管收本里十甲之粮。又于内拣选殷实上户方金解，户不分税粮、条编，俱用粮长酌量难易金解，余剩之人帮贴。庶人众则征收不累，本里则银数不多，勿得违错。

明初“以万石为率”^⑨，负责一个粮区征收解运税粮的大粮长，这时已演变为里甲内服役的小粮长^⑩。

徽州社会经济的另一特点是徽商崛起。正德以后，徽州世家大族中有人先是当粮长：“收赋公府，犹极衽跃马，朝出暮归”；后来做盐商：“即贾淮扬”，“乘轻舟若飞鸟”^⑪。实现了由粮长向盐商的角色转换。而在本土充当粮长则“人人畏避”：

钱粮为身家之累，人人畏避，加以衙门使用，愈加困惫，故有当一介粮长而遂败其家者，良可悯也。访得管粮官有比较贽见礼，吏书有常例见面钱，关领勘合，转文倒解本府，吏书又馈送扇烛，求索常例，及解官房水马匹俱派于粮长，种种夙弊不可缕悉。^⑫

各个环节的官吏都向粮长伸出了索取的手，势豪大户和富商都不愿充当粮长，官府金点粮长成为难题。古之贤在《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中针对徽州“有富逾巨万而田粮反少”的实际，要求金点粮长以财产为标准：

徽民之富，不系田粮，有富逾巨万而田粮反少。又有奸猾之民，田粮本多而花分子户，其粮长皆不及金也。又有势豪大户，假以无干生员冒认丁粮，干嘱缠绕，而软熟有司，曲徇人情。以上户未必金，金者未必上户，人心不服，实由于此。以后掌印官务要严拒请托，查并花分；如果殷实，田粮虽少，亦要金点。

又在《呈详复议会计缘由》中明确提出“审丁粮兼审家赀”：

本府窃见金点粮长专凭丁粮，而奸民巧于花分，势豪惯受

投献。至于歛、休富民，则又不在田粮而在家赀，粮长安得均平？故请公粮长之选。……严并花分，毋滥优免，审丁粮兼审家赀。^⑬

古之贤把“审家赀”作为佥点粮长的重要标准，无疑是针对徽商而言。但一些“藏镪百万”的富商为摆脱粮长之役，或不惜重金买通胥吏，或占商籍，或在寄籍地入籍。他们把“田粮尽卖而挈家商徙，弃下坟、粮户口而累里赔”^⑭。粮长之役还是被推到了中小农户身上。

梁方仲先生曾经指出：明中叶以后“商业和商业资本有了‘一马当先’的迅速发展”，并已形成了与农业、手工业不相适应的局面^⑮。徽商极力摆脱粮长之役，实际是为了挣脱相对落后的农业及其生产关系的羁绊，同时也代表了工商业者对确立社会分工的要求。

(二)教育与士风

明中叶以前徽州社会以农耕为主。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徽州乡村教育发达，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为典型概括。明代嘉、万之际，汪道昆大量为商人立传，可视为文化转型的表征^⑯。徽州农耕文化的传统，从元末理学家郑玉的论述中可见一斑。郑玉出生于以农为本的家庭，自称“世以孝悌力田相遗”^⑰，倡导“昼耕夜读”，提出耕读结合的命题^⑱。

明正德末年开始，随着人口的增长，山多地少徽州人“出贾既多”。就教育来看，耕读结合已经不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士商结合。经过“家有塾，党有庠”的启蒙教育阶段以后，都挤到了科举这条道上。古之贤作《训士录》说，“人情譚登科则喜，遇下第则怒”。徽州童生考试竞争激烈，以至有落考者聚集请愿，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徽州府出告示加以禁止：

示谕童生知悉：照得考取童生，原奉院文有限数。本府念多才之乡，收罗不尽，外加一倍。其法体止于如此，良云宽矣。若经各县考落，及本府截止者，如果怀才被屈，情出迫切，止应

赴府哀恳，干求再试，伏听处分。则上有怜才之恩，下有尊上之德，是为得之。因何号召多人，喧填街市，围拥官轿，啖声如雷。上下之间，一言未通，无闻哀恳之声，以鸣己志，徒类叛逆之状，大坏士风。纵功名之心诚急，然身家之念岂无。倘根究倡首之人，干累父兄，陷于刑辟，亦不可不慎也。何可自恃人众难查，敢于无将哉！至于不安义命，嗟怨主司，惯贴谤书，有损德行。方进身之初，已坏心术。则使才同班马，而不思□，鬼神已薄其德而扼其遇矣。如此薄恶之风，与夫喧哄之计，虽积惯已久，然亦以前为上者失于处分，失于禁谕也。为此合行出示通知：凡系六县考落及本府截止童生，宜各安静读书。^⑯

徽州府学童生名额已“外加一倍”，仍然无法满足需求。由于有良好的乡村教育基础，徽州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考落童生闹事反映了徽州教育超常发展与科举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徽商则于十余年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由巡盐御史叶永盛题定商籍，在杭州设立崇文书院，培养子弟读书应试，为商人子弟入仕开辟了新的通道^⑰。

教育与文化的转型影响到士风转变：

名虽曰士，初无士行之寸长；身虽曰儒，徒为儒服之冠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轻慢前辈，违逆父母而逸乐度日，怠忽师长而放荡无时。试不仕则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张则谓庸流之滥得。……预乡荐者自为意得志满，不复进修；入省闱者则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挟长欺孤。常交贵结援而每夸等流，以只字片文而蔑侮同辈。在市道则和合贸易以觊其所得，遇州县则斗殴争讼以满其所求。……迩者，荣业相传之后屡有声明，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营业之子安分读书，无形颜色；每见儒冠之后自恃名族，多有骄矜。^⑱

传统道德观念在有些士人身上已荡然无存。当然，所谓“和合贸易”，所谓“争讼”，亦是士商结合的表现，是时代使然。古之贤所肯

定的“营业之子”当是商人子弟，他们比“儒冠之后”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而较少浮躁心态。

(三)妇女风俗

明初，徽州人以农林为业，安土重迁，风俗淳朴。[弘治]《徽州府志》载：“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服。女子正洁不淫泆。”^②这是对农耕社会民风的概括。迨至正德末嘉靖初，徽人经商居多，风俗随之发生变化：“出贾既多，田土不重”，“芬华染矣，靡汰臻矣”^③。徽商经营以杭州、扬州、南京等地为多。这些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商贾聚集，娼妓盛行。徽州是一个交通闭塞之地，但蓄娼之风由南京等地波散而来。徽州府发布《行六县禁革娼优》告示：

为禁革娼优，以厚风俗事。照得府属地方不系通津聚商之处，俱是本地耕食凿饮之民。间有父兄经营居积致富，类从辛苦中得来。致遭不才子弟嫖赌，挥金如土，不知爱惜，反以父资于娼优家争相雄长。慕豪侠之风，成淫荡之习，恬不为怪，不过数年，立见倾败。况近年来生意艰难，利息轻少；纵父兄终岁经营四方，止足供膳入口。兼以风俗侈糜，子弟不才，安得长守其富也。所属故家巨族，较之正德、嘉靖之年，已十不及一，良可叹惜。近访得岩镇地方盖造整齐店屋，召住艳丽名娼，包留善歌舞，思欲比赛南京旧院规矩，以为美谈。遂至诱引富家子弟昼夜歌舞，风俗荡败，奸盗悉从此生。不思古云：作法于凉，其弊必奢；作法于奢，弊将何极？是其渐不可长也。况京师系四方人杂居之地，尚可容留。今府属则礼义淳朴之乡，岂许召聚异省趁食之人、妖淫粉黛之流在此浊乱风化，生事地方也。合行严禁。为此仰县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转行巡捕官：将外来娼优悉行赶逐。其有造房开店停留者，即便申究。如有地方容留不报，一体查究不贷。每月终仍具各地方不致停留外来娼优，结状申府，先具遵行缘由，缴查毋违。

“岩镇”为歙县首镇,不仅有“整齐店屋”,还是村民文化娱乐中心。《新安竹枝词》中就有“岩镇迎神正月九”和“七月荷花灯苦热”的描述。南京的“艳丽名娼”,“善歌女戏”跋山涉水来到崇山峻岭中的岩镇,影响了徽州的风俗。同时也反映了明代江南中心城市的商业文化对乡镇有着较强的辐射力。徽州府行文禁革、驱逐,只是表明了官方的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的形成并不是一纸公文即能扭转的。正如明代国家法律禁止士大夫嫖娼,但明中叶以后士子招妓之风盛行^②。

明清时期徽州妇女节烈风气最盛。有人把节烈风气的成因归纳为:国家旌表制度、宋元理学、宗法制度等方面^③。这是不错的。但从《新安蠶狀》中史料来看,徽州妇女节烈风气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事诉讼、审判中对妇女肉体和精神的直接摧残。古之贤要求县衙“照律”减轻对妇女的刑罚与羞辱:

为禁革重枷,以全民命事。照得律称枷号俱有明例,方许用枷,及临时遇有特旨用重枷者,不在律例之内。至江陵当事,痛恶奸伪,始行立枷重三百斤,十无一存者。今奉部文奏免。仍申饬有司宽刑狱,恤民命,无非厘革酷虐之习,以养和平之福也。合应推广,以宣德意。今该本府入仕以来,窃见在外有司不谙事例,动辄用枷。或三两人共一连枷,或将妇人与男子同枷,或用重大湿木至一百二十斤以上之枷,俱先打后枷;既展转不便,痛楚不胜,未有不死者。既死,不与相埋,仍荷枷不解者有之。以此口决不待时者,其刑尤惨矣。

又妇人犯罪应该拷讯,止用拶指,其决断应照律,犯奸者方可去衣。凡孕妇仍限产后施刑。俱已通行外,本府于乡党中习见有将孕妇用夹棍,又加火烙立死者,殊干和气。今徽俗构讼,动告妇人,一经提解,遂被无端羞辱。况律有“坐夫男”之句,何必株连,致干风化。拟合通行禁约。

为此仰县官吏即遵照牌内事理,制造木枷三号:第一号重

八十斤，横直二尺五寸，俟极恶罪人方可施用。第二号六十斤，横直二尺二寸。第三号四十斤，横直二尺。各用干杂木为之。其有湿木重枷并连枷俱禁革不用，妇人犯罪止用拶指拷讯，不许擅用夹棍及一概勾提，致伤风化。^②

徽州府禁革“重枷”的文件无疑是研究明代法制的难得史料。从中可见，明代基层司法往往不能“照律”审判。所谓“今徽俗构讼，动告妇人，一经提解，遂被无端羞辱”，又违律“擅用夹棍”等刑具。由此可见社会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司法制度的渗透。

明代徽州风俗的变迁体现在妇女生活方面极具特点：由于徽商在大城市得风气之先，把蓄娼等“侈糜”之风俗带入徽州。而传统社会势力藉宋明理学和宗族制度，由观念层面影响到司法实施，又进一步加强了徽州妇女的节烈风气。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以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新安蠹状》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其史料价值不止于此。如在《禁生员举贺耆民》中就反映了明代乡饮老人的变化。明初老人“剖决民讼”^①。到万历时徽州民间聚讼，主持者已“非有齿有德之人”。老人名虽存，但威信不再：“三五生员制为匾轴”，“索求酒食，名曰庆贺，实相扰累。而年老吝啬之人因惜费而轻礼，恐被累而逃名，安得不以乡饮为诟病也。”又如在《申详院道严禁拐盗缘由》中，古之贤把“歙县知县彭好古将该县典当铺户尽数藉名在册，给照稽查”的管理经验上报后，“奉钦差巡抚右副都御史余批开：江南大盗多借典当以为寄圃，……不独新都一郡当行也。仰徽宁兵备道通行各府严行禁约，有犯毋赦。”通过这些报告及上司批语，可以具体考见明代府一级机关的行政实态。总之，《新安蠹状》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是多方面的。

注：

①谢国桢：《春明读书记》，《文献》1979年第1辑。

②[万历]《祁门县志》卷四，《赋税》载：“万历十一年改行条编派征，类凡

三:一物料、一徭费、一岁役。”

③⑬古之贤:《新安蠹状》上卷,《呈详复议会计缘由》。

④《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

⑤参阅夫马进:《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⑥[万历]《歙志》卷三。

⑦[万历]《休宁县志》卷三。

⑧同③,上卷,《申详裁革坊里祗应粮长空役稿》。

⑨《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⑩安徽省博物馆藏《歙县洪氏光裕会簿》万历三十六年收支账载:“一支银一两,付六甲里长黑九奇、罩老奇为粮长事,后添作小粮长使用讫。”这时的小粮长已在里长的指派下服役。

⑪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南山》。

⑫同③,下卷,《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

⑭天启《休宁县赋役官解条约全书·官解初详》。

⑮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⑯同⑪,卷三九,《世叔十一府君传》言:“吾家自曾祖父而上,率孝悌力田。自祖父亢始宗盐筴。……徙武林,业塾起。”可见徽州大族由农而商的转变。

⑰《师山先生文诗遗录》卷一,《郑氏石谱序》。

⑱《郑师山文集》卷五,《耕读堂记》:郑玉提倡,“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人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

⑲同③,下卷,《训录·禁童生喧哄》。

⑳安徽省博物馆藏康熙《紫阳崇文会录》十二卷,其载:明末清初旅居杭州的徽商子弟就读于崇文书院者达1654名。首卷《书院通考》云:万历年间“学政于州县正考之外,另试盐商子弟。盖念伊父兄挟资远来,为国输将,所以隆优恤之典,广进取之阶。”入清,书院商籍生员有不少人官至要职。如徐旭龄,康熙九年任两淮巡盐御史,“巡按两淮盐课”;胡文学,“视两淮盐政,辑《盐政通考》,撰著《淮鹾本论》”。

㉑同③,下卷,《训士录》。

㉒[弘治]《徽州府志》卷一“风俗”引旧志。

(下转第267页)

文煥，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著有《石室秘钞》。魏宪承其家学，亦能诗，著有《枕江堂诗》十卷。《百名家诗选》共八十九卷，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圣益斋刻本，原为郑振铎先生所藏，现归国家图书馆。

注：

- ①载《文献》2003年第3期。
- ②④齐鲁书社，1997年。
- ③北京出版社，2000年。
- ⑤谢正光、余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作者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接第 239 页）

- ㉓[万历]《歙志·风土》。
- ㉔赵轶峰：《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 ㉕周致元：《明清徽州妇女节烈风气探讨》，《'95 国际徽学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㉖同③，下卷，《行六县禁革重枷》。
- ㉗《皇明制书》卷九，《教民榜文》。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博物馆